

『人与事』中的文学社群

现代中国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文化生态研究

杨洪承
著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文学研究会

浅草沉钟社

创造社

新月派

.....



人民
出版
社

“人与事”中的文学社群

现代中国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文化生态研究

杨洪承
著



●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 敏

装帧设计:亚细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与事”中的文学社群:现代中国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文化生态研究/

杨洪承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

ISBN 978-7-01-013459-8

I. ①人… II. ①杨… III. ①文学-社会团体-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5728 号



“人与事”中的文学社群

“REN YU SHI”ZHONG DE WENXUE SHEQUN

现代中国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文化生态研究

杨洪承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7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7-01-013459-8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第一辑 现代中国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文化生态总论/1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社群文化生态与心态考察的思路/3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社群文化生态中的意识形态系统/19

第三章 中国现代作家社群文化生态中的“中国形象”结构/33

第四章 中国现代作家社群文化生态中的“公共空间”认知/48

第五章 学术史视野中中国现代作家社群文化研究的理路/64

第二辑 现代中国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文化生态纵横考察/79

第六章 近代中国新知识群体与文学社团兴起的文化基础/81

第七章 20世纪20年代文学社群聚散组合的文化取向类型/104

第八章 20世纪30年代社会剖析派作家群的生成与形态/126

第九章 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学社团之关系/147

第十章 王统照与“文研会”生成之关系/161

第十一章 蒋光慈与“左联”革命文学团体生成之关系/175

第三辑 现代中国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文化生态个案解析/189

第十二章 “新青年”模式与现代中国纯文学社团生成之源/191

第十三章 “文研会”文化形态的历史路向考辨/203

第十四章 “文研会”生态元素与文学史的意义/230

第十五章 “左联”意识形态信仰系统与社团组织机体/246

第十六章 “京派”地域时空置换与独立的文化生存/265

第十七章 现代派作家群体的生命形式与创作的文体创新/283

第十八章 七月派作为文学流派存在的文化结构/298

第十九章 “文协”社群形态在抗战文学中的文化作用/311

参考文献/329

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索引/333

现代中国文学重要作家索引/335

后记/338

第一辑



现代中国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

文化生态总论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社群文化生态与心态考察的思路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社群十分丰富而复杂。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在纯文学的范畴里，有意聚合、有章程的文学社团，与松散的、随兴趣的、相似相近的文学流派之界定和区分，应该说是比较简化的，理解文学群体的生成有很大局限性。现代文学的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为“文研会”）、创造社、湖畔诗社、新月诗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为“左联”）、新感觉派、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为“文协”）、七月派、九叶诗派等群体，在文学史上的活动和价值，显然也不是常规的文学主张、刊物阵地、作家作品等自足文学本身所能够反映的。“文学社群”作为文学史的一个整合动态概念，既保留了文学社团、流派的基本群体特征，又具有社与群结合的文化范畴，更强调诸多文化因素的包容性，这就使得原有的文学社团构成了一个知识文化谱系：有着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内容；也保留着结社的地域和文人雅聚、宗派、党派等传统文化因素；更有现代知识分子生成中的特殊资源

「人与事」中的文学社群

(经济、政治、教育、报刊出版传媒等),并且形成了现代文人聚散独有的途径、政治意识、文学主张、组织结构等精神风貌和生命形态。

由此,在“社群”概念和视阈里,文学社团流派的本质认知,是其文化生态和作家聚散心理的文化整合研究。文学社群的整体考察,现代文学群体发生发展的丰富生态,是在“文化场域”中透视诸多文学社团流派聚散之缘由,从而立体地考察作家和群体之间人与事活动的心理动因、行为倾向,并由此形成作家创作个性、文学风格与群体文学倾向、文学主张之间的关系等,及其背后深层的主客体复杂因素。就其问题角度说,研究现代文学社群的“生态”与其作家的“心态”关系,意在找寻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文化场域”的构成因素和心态之间的联系,从而深入探究现代文学社群视阈所独有的内涵。

—

地域在现代作家聚散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地域的因素构成了一类群体。如现代文学中的“京派”、“海派”、东北作家群、山药蛋派等群体命名的本身就鲜明地标识着地域特征。但是,地域文化特性并不能够完全替代文学群体的特征。现代作家聚合在一起进行文学的倡导,驱使的动力何在?尤其来自每一个作家心理的活动更为复杂。地域因素形成了文学社群整体生存的文化生态,其生态是如何与群体心理构成发生关系的,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内容。

以往的社团流派研究也注意到地域的因素,但地域往往只是作为群体和个人的活动场所、生活创作的背景而存在的,人们的目光更多地关注此地此时与外部的社会政治理想、政党关系、派别论争而关联的群体的人与事;或者从区域性的经济利益出发,强调群体赖以生存的地域报刊杂志以及资助的出版商等对群体生存的影响;或者将群体一致的文学兴趣、喜好和共同的文学理想主观理解为是地域在起决定性的作用。从

这些方面切入群体的研究，虽然多少也解剖了现代文学各种社团流派的某些本质，但是最大的认知缺陷是将群体生成的复杂性简单化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研会”和创造社，一直被文学史家认为是最为统一规范的社团，但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作为当事人的茅盾，就明确地说过：“就我所知，文学研究会是一个非常散漫的文学集团。”^①同样，创造社的元老之一郭沫若当时也直言：“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强求相同。”^②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完全认同他们的表白，但这样的解释至少可以表明他们的形成和生成，不像人们对社团的简单认知那般，而是充满了诸多丰富、复杂的元素。事实上，任何群体的聚结都联系着一个较为驳杂的人与事的网络，一个大的文化生态。它包孕着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形成群体过程、个体的关系链对群体的作用，群体的排他性对个体言行举止的影响，以及群体活动的空间和生存的经济基础等多重循环或相互制衡的文化关系。回到地域对群体生成的话题上，地域因素绝不仅仅是个体的生活之地。群体最初的酝酿联系和沟通发端于同乡之间，来自潜在的故里同人亲和、熟悉、彼此了解的心理认同。

因此，文学社群形成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活动，其中对群体产生深刻影响的最为关键的乃是“现代人”开放的心理因素。现代作家群体的衍生和现代作家心理活动的动因：一是联系着传统文化的血脉；二是重建的现代精神追求。这两者的悖论交织于现代知识分子一身，伴随他们从封闭走向开放。在这一进程中最明显的变化标志，就是他们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地域的更换和流动，常常使现代知识分子远离故乡，客居异地，且在地域间不断迁移变化，这种由“身”的生存转

① 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1日。

② 郭沫若：《编辑余谈》，《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1922年8月25日。

移也随之带来了自觉不自觉的精神之乡的寻找，“心”的归宿感更为强烈了。这是现代人的精神悖论，又是现代群体聚合的原动力。不同地域的因素影响了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是现代文学社群“生态”与“心态”关系的第一要义。

现代文学的开篇，新青年杂志社从陈独秀主编到同人轮流编刊，以及这个杂志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溯源不能不归结陈独秀、胡适两位安徽同乡的关系。五四时期的晨光社与湖畔诗社的发源地和浙江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杭州西湖也均有直接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中期活跃于文坛的狂飙社，被认为是“一个以高长虹为首，山西人为主干，以后亲戚好友陆续参加的同人社团”^①。可以说，现代中国文学群体的聚合多少都有地域因素的乡情纽带。20世纪20年代的“文研会”最先表现出新文学建设的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意识及文学变革意识，与郑振铎、茅盾、叶圣陶等十二位发起人集中来自福建沿海地区和江浙长三角地区有着密切关系。正是沿海地域的率先开启民智，江浙一带商业的发达，较早突破了小农经济的桎梏，对于这批先觉者的文学变革精神产生了巨大影响。创造社的四大元老最初都是在日本东京高师语言进修学校学习的同学，后来分别学医学、经济学、地质学、军事，并不学文学。这批留学生不仅仅走到一起了，而且共同有感于文学与生命的联系、与内心喜怒哀乐的情感共鸣，共同的弱国子民之精神压抑与侨居异域的乡愁乡恋，在寻找着宣泄和排遣的通道。与之类似的浅草沉钟社是一群来自四川的“不安定的灵魂”，最初是由同乡的关系自然形成的团体；同样，30年代的“左联”与上海也是密不可分，上海这一最早聚商业化、工业化、殖民化、市民化为一体的开放都市，吸引了一批向往新生活的作家先后定居于此，甚至不乏从日本流亡回归的作家，也有刚刚接受共产国际（日本、苏联）新思潮归来的青年作家，等等。“左联”的行动纲领明确指出：“我

① 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上），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页。

们文学运动的目的是求新兴阶级的解放。”^①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源地，加之商业自由带来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才有了“左联”以革命为中心，政治派别和文化取向多元交叉的生存空间，乃至形成形形色色的作家文化心态。1938年的“文协”组织成立于大武汉。抗战初期从东北、华北、华东各地来武汉的作家、艺术家、民主党派成员、文教界人士聚集武汉。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域：武汉三镇本身巨大的社会空间，及其地处西进、南下和入川的交通枢纽地位，自然成为了战时作家心理上可接受、可进、可退守的首选之地。不难看出，每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群体与特有的生存之地都有密切关系，这不仅仅是社群实实在在的存在和活动之地，而且是群体和每个作家心理的精神之乡。考察现代文学社群整体的文化生态，最重要的应该是探寻群体精神的心理图式与他们自觉选择的生存环境相一致。20世纪20年代“文研会”、语丝社的现实主义，创造社、湖畔诗社的浪漫主义，浅草沉钟社、弥洒社的现代主义等风格，与他们各自实在或潜在的地域因素营造、影响了群体相近的心理共鸣、文学兴趣密不可分。

二

现代教育体制的出现建立了文学社群现代性知识谱系的生态平衡，是决定现代作家聚散心理又一不可忽视的因素。新文化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即现代教育体制的建设。五四时期各种类型的学校、大学形成的现代教育文化，与新型的现代文学构成了互动的平台，现代文学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文化资源，现代作家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传统的旧式“四书五经”的私塾家教，在近代科举废除后，新学堂转向以现代国文、西学教育为主。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一方面自觉接受了西学课

^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

程的格致、天文、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寻求别样的人们”以更为开阔的视阈走出国门。这使得现代作家个体的发展和群体的联系方式都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代不同知识背景和新式教育的不同途径，彻底断裂了过往聚合和生存主要依赖同乡同族关系这条纽带，形成了现代文学社群新的生态平衡。以新学教育的教师和学生构成的现代知识分子主体，也是新文学队伍的主体和现代文学社团建设的基础力量。在此基础上，现代教育（大学）与现代文学自然联姻结合。一大批活跃在五四文坛的现代作家都与学校有密切关系，如陈独秀、周作人、叶圣陶、徐志摩等与北京大学；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与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瞿世英、冰心、许地山等与燕京大学等高等学府；还有胡适与中国公学、鲁迅与南京水师学堂、王统照与中国大学、耿济之与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庐隐（黄英）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郑振铎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等新式公学、专科、职业、私立教育学校。在这些新式高等学校中，他们较早地接受了自然科学和人文主义的西学知识谱系，经历了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和转型。五四新文学作家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学建设的一切理念都与他们文化教育的背景有密切联系。如胡适、鲁迅对西学《天演论》的接受，决定了他们社会进化观的思想形成。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能够成为新文学初期的理论纲领，也是与他本人接受东洋“新村主义”和西洋“人道主义”的教育分不开的。

开风气的现代教育不仅滋养了新文学的作家队伍，而且新学教育营造了校内外开放的文化环境，给寻求新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相当自由、宽松的活动空间。这是五四所开启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得以应运而生所不可或缺的环境与氛围。茅盾当年就统计过，“从1922年到1925年，先后成立的文学社团及刊物不下一百余”，并且指出，“这一大活动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以及职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团体和刊物也许产生

了以后旋又消灭，然而他们对于新文学发展意义却是很大的”。^①正是“不满四川的窒息空气而到北京、上海求学”^②才有了林如稷、陈炜谟等人组织的浅草沉钟社。是新学公寓式的住宿环境和校外自由寄宿的方式，使得本不属一个学校的王统照、郑振铎、耿济之等人能够在校内外经常有机会会面、交流和讨论共同关心的人与事，从而自发酝酿组织了“文研会”。现代文学社群文化生态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新学教育体制下营造了学生（新文学主体）自由活动范围的“公共空间”（可以自由表达思想的场域）。“它们和封闭社会形成鲜明对比”，这个完全“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特殊领域，在中世纪中期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存在的”。^③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他们不仅可以经常聚会结社，而且还能够自愿结资办刊物、出报纸，乃至开书店和办出版社。一是通过实地空间自发的活动，如新月社最初的聚餐会、诗歌朗诵会，湖畔诗社的一次西湖聚会游；二是通过媒介空间的纽带，如叶圣陶说：“我不在北京而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在北京《新潮》上登了几篇小说，大家认为这个人能写小说的。”^④同样，在上海的茅盾认识北京的王统照，也是最早通过读他在《妇女杂志》和《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创造社的郑伯奇说：郭沫若“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那首《死的诱惑》，并且通过日文翻译”，“以后我在国内的报刊上经常以敬佩的心情读到他的作品。但对于他的身世，却一无所知”。^⑤“公共空间”和现代教育开放民主的氛围互为一体，形成了文学社群生存的知识生态。同时，在这一思想的自由之地，个体的独立自主的思想启蒙和群体变革的民主思想

①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序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5—8页。

② 陈永志：《灵魂溶于文学的一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③ [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42页。

④ 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49—850页。

⑤ 王延暉等编：《郑伯奇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意识的文化心理也获得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现代教育视阈中，现代文学社群的生态与其群体精神心理的互动关系恰恰找到了内在联系性。如现代文学的学衡派、新月诗派、现代评论派等群体作家主要是一批接受了西洋欧学教育的留学生；还有 20 年代的弥洒社、30 年代的新感觉派、40 年代的九叶诗派等群体，尽管他们并不是直接留学西洋的学生，但其一般是英美文学爱好者或者是在国内大学里学习英美文学的大学生。他们普遍受到英美新人文主义文化教育的影响，接受了现代民主政治、经济和技术的科学主义的文化观念。像学衡派确立了“论究学术，阐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①的宗旨，从而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保持了一种中和、兼容的态度，在激进的反传统中近乎保守。而在新月诗派、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作家身上处处可见的注重理性、秩序、纪律、修养等“绅士风度”的精神心理，与其西学文化教育知识背景是密不可分的。九叶诗派的诗人追求现代主义思想、情感的表达方式，强调表现人生现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显然也与他们接受了较系统严格的高等教育有关。美国批评家马·布雷德伯里（Ma Bardbury）说：“现代主义是大城市的艺术”，是“为少数具有高度审美力的人而创作的艺术”。^②同样，现代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研会”、前后期创造社、“左联”等团体组织，无论是整体社群文学主张的基调，还是其创作的风格和特征，所表现出的明显的激进、对立、亢奋、偏执等心理元素，都与其群体成员和作家们深受东洋文化教育、苏俄教育体系影响有着直接的精神联系。这些是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

①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 1 期，1921 年。

② [美] 马·布雷德伯里、詹·麦克法兰编：《现代主义》，胡家峦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1 页。

三

现代政治经济的杠杆作用决定了文学社群运作方式方法的生态环境与现代作家聚散心理调节的原动力。如果说上述两个层面是在相对独立的视角考察现代文学社群文化生态构成,那么,现代社会日益变化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于社群的运作关系则不容忽视,尤其对作家心理元素的变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政治与经济这两个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支撑点,对现代文学群体的酝酿和发生发展有着内在机体的调节功能。诸多现代文学社群生命的长短与否,一个最显著的因素往往决定于“政治与经济”的文化作用。文学群体的“政治”意识的形成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态度和思想倾向的问题。同样,“经济”作为重要基础,也不只是文学群体生存唯一的条件。“政治与经济”作用于现代文学社群是在一种文化视阈、一种文化渗透中表现出的文学群体的策略的行为。确切而言,现代政治与经济的特殊文化语境业已产生和构造了现代文学社群特殊的文化生态和作家聚散的特殊心态。

现代文学中的20年代末的太阳社、30年代初的“左联”,30年代末的“文协”等团体,其生存、运作与鲜明的社会政治色彩、大时代的风云息息相关。这些团体其群体构成就是由中共党员和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作家组成,或明确表示接受党的领导,或坚持“统一战线”的立场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的活动。除此之外,在倡导革命文学中,作为文学社群的太阳社对于文学功能、性质等理解,也实际上渗透了双重身份的作家和革命者阶级互为对立的思维方式。如阿英(钱杏邨)的《死去的阿Q时代》等文章。“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新任务》明确指出:“在方法上,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作家、指导者和批评家,必须现在就开始这方面的艰苦勤奋

的学习”。^①这就直接地规范了“左联”群体文学创作的内容，如：女作家丁玲创作转向的小说《水》、《母亲》等作品；茅盾“社会剖析”的小说《子夜》等；还有叶紫的小说《丰收》等作品，集中展现了“左联”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而抗战初期，“文协”组织始终保持民主、自由的群体精神向度，它以组织作家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的活动，动员作家进行募捐活动，举行著名作家祝寿会、诗歌朗诵会，以及文学专题纪念会等多种活动形式，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借助文艺、文学来宣传抗战，表现抗战。这些文学团体正是以鲜明的政治色彩呈现了自己的个性，并且将政治的多途径的参与内化于作家的创作之中，直接决定了团体的聚散。在他们身上，政治的因素既是团体生存的文化氛围和语境，又是文学群体创作的风格和其聚合的心理因素。比如，当年《拓荒者》、《萌芽》、《十字街头》、《北斗》等杂志代表了“左联”团体的文学走向，同时，它们也引领了当时文坛的办刊心理。30年代初，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了一种现象，“近来颇流行无产文学，出版物不立此为旗帜，世间便以为落伍”，^②文学团体受其影响何尝不也是如此。除30年代强烈政治倾向的团体外，就是五四时期以文学爱好和兴趣相投而自发聚合的创造社群体，在1925至1927年间政治风云和社会变革的作用下，如创造社就有了文学史上前后期文艺方向的“转变”之说^③。现代文学社团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作家的创作变动、调整与群体分分合合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与政治文化共存共生的是经济文化杠杆。这一文化层面更大程度地表现了现代文学社群生态与其心态的内在关系。相对而言，现代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二重组合，作用于文学生态最直接的因

① 《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

② 鲁迅：《书信·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③ 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页。